

将“上苍”理解为人类本身

——试谈《金翼》揭示中国人的生命根底与行进

李达镐

北京大学 北京海淀

【摘要】林耀华所著《金翼》以半自传式叙事，描述了中国传统地方社会黄、张两家的命运起落。体会《金翼》中“将‘上苍’理解为人类本身”这句话，即中国人的命运轨迹既根由于与生被赋予的社会既定和变迁，同时又包含后天的自主抉择。启发我们认识本书所揭示的群体视阈下中国人由传统家庭本位的乡土社会结构、人际交往网络、土地的给养与粘结、由祖先神明崇拜生发的仪礼信仰、家庭、家族主义文化构成的生命根底；及个体视阈下基于社会政治经济变迁致使“非均衡”，适应调整进而实现“再均衡”和生命行进。

【关键词】《金翼》；生命根底；适应调整

Recognizing “heaven” as humankind themselves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Golden Wings revealing the substructure and advancement of Chinese people's life-passage

Dahao Li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Abstract】 The Golden Wings written by Lin Yaohua is a semi-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 recounting the wax and wane of the Huang and Zhang cla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indigenous society. Experience, in The Golden Wings, the expression "Recognizing 'heaven' as humankind themselves", whose connotation is the destiny of the Chinese people is not only predetermined by the endowed social nature, but by acquired autonomous nurture".

That ignited us to comprehend, as revealed in this book, under the group outlook,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family-based rural social structure, gregarious communication network, estate sustenance and maintenance, ritual beliefs arising from the worship of ancestral deities, also including, the foundation of life constituted by family custom and clan cultur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s, grounded on socio-political and economic vicissitudes, resulting in “unequilibrium”. So that we can adapt and adjust to achieve equipoise and progress anew.

【Keywords】 The Golden Wings; Substructure and advancement; Adapt and adjust

1 概述与回顾《金翼》

《金翼》描述的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福建省古田县湖口镇黄村里黄、张两家的命运轨迹。黄东林在其祖父去世后，同姻兄弟张芬洲合伙经营稻米和咸鱼买卖，生活愈益向好。两家盖起新房，张家占地“龙吐珠”，黄家建起“金翼之家”，其间，黄东林因盖房惹上官司，并由此意识到教育的必要性，而将三哥和小哥送去接受教育；但其后黄、

张两家关系也慢慢疏远。而后，张芬洲儿子的死、对生意和其他变化的不适等预示着张家命运的日渐走向衰败。与之相反的是黄东林家，在面临一系列麻烦事时谨慎正确地适应与处理，使其在商界、政界的影响力不断提高，积极适应社会的变迁，欣欣向荣。两家的命运走向不同的极端。直至“七七事变”，一切又都复归原点。以小说讲述家族兴衰起落，自述少年至老年的生命历程；涉及家庭结构、

社会制度、风俗人情、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方面，展现了一幅中国传统社会运行和中国人社会生命建构的广阔图景。

“将‘上苍’理解为人类本身，将‘命运’理解为人类社会”是林耀华先生在《金翼》中的精彩表述。社会本身的逻辑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了我们的自然，并促使我们承认中国人的命运构成很大一部分受社会给定的条件限制，当然也不可忽视个人在其后对自身命运的适应求变和把握。这本书的意义正在于通过民族志的手法进行类似于“白描式”的展现，揭示了中国人的生命根基在何处，中国人的生命何以行进。

2 中国人的生命根底

2.1 传统家庭本位的乡土社会结构

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往往不仅在于个人的自主意愿选择，更在于其所处的生活圈子以及其间生发的关系和互动。于中国乡土社会而言，以宗族组织为根基，以传统家庭为本位是其显著特征。就中国乡村普通人的生命构成和社会关系而言，宗族、家族及其中的个人形成了一而三、三而一的并合和互动。由个人构成家庭，由家庭延伸为宗族社会，使得每一个个体都深受这一稳固而隐含变化的乡土社会结构的影响，而这一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是中国人生命根底的重要构成要素。

“家庭是围绕着一个由习俗、责任、感情和欲望所精心平衡的人编制的强有力的网。”抽掉其中的任何一员，扯断他们之间得以维系的任何纽带，家庭便会面临着解体的危机。林耀华先生在写作《金翼》时就是以黄、张两家的家庭（各成员）为基本单位展开的。传统的乡村家庭是血亲关系居主位的父子主轴的主干家庭。尤其是一家的成年长子作为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决定着一整个家庭的兴衰成败。在《金翼》中，可以看见传统家庭的基本稳定对个人的行为选择和乡土社会系统的整体均衡的深刻影响。因此，在爷爷去世后，黄家要找到新的替代，追求新的平衡，东林便成了一家之主（东明务农耕，东林主从商），通过合伙经营的有效分工使黄家重归稳定的轨道。当然，妇女与男子在家庭经济体制中能起同样大的作用。没有她们来贮存、准备食物、管理家务、收拾衣服、洗衣做饭，男人就不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家庭劳动中去。家庭里的女性成员一

般包括婆婆、儿媳妇和孙女。婆婆在旧式家庭往往冲动“拟家长”的地位，其在管理家庭事务中的权力往往是很大的。婆婆对儿媳妇的“统治”体现出了传统家长制度、等级制度下对维持家庭稳定的重视。儿媳妇如能吃苦耐劳，操持好家务等便满足了基本的标准。

事实上，基于农耕传统的生产分工和“男主外，女主内”的风俗传统，中国传统家庭体现出强大的稳定性和自我调节性，其不断凝聚和强化血亲关系和集体分工关系，生发出强大的内聚力和向心力。但正如林耀华先生所指，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普遍存在着宗族与家庭的连锁体系。除了独立认识传统家庭构成外，也需要关注家庭的在整体乡土社会结构的“本位性”，在宗族组织的认知下展开分析。

一个个家庭成了社会最基本的结构单元，同一祖先的家庭的聚居产生了共同的利益相关和事务处理，因而催生出一套具有严密等级的家长式的宗族制度。不同的等级又演进成各层的功能单位——家、户、支、房、族，组成所谓“乡村社会”。家是经济单位，户是社会交往单位，支是宗教祭祀单位，而族房长，亦即祠堂会，乃是上述功能的综合单位。《金翼》所记载的黄东林在与阿水这位族长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维护和彰显了本族的荣耀而显得意义非凡。而将这一观点放诸当代审视，在中国东南地区的传统农村里，宗族身份认同和利益维护依然无形之中深刻地影响着其中各户、家庭、个人的行为选择。传统家庭本位的乡土社会组织下的经济生产分工为人们提供物质给养，建构社会关联，还给予人们一种精神归属，比如远离家乡的人总有“思乡之愁”。家庭、宗族社会，沉淀的是千百年乡土社会构造的历史底色，还肩负着文化传递和保存的重要责任。以传统家庭为本位的乡土社会结构，尽管历经历史风雨涤荡，却依旧以其既定的寻常规定或规着人们的社会生活，深刻构成了中国人的生命根基。

2.2 人际交往网络

在《金翼》中有一段话十分重要：“我们日常交往的圈子就像是一个由用有弹性的橡皮带紧紧连在一起的竹杆构成的网，这个网精心保持着平衡。拼命拉断一根橡皮带，整个网就散了，每一根紧紧连在一起的竹杆就是我们生活中所交往的一个人，

如抽出一根竹杆，我们也会痛苦地跌倒，整个网便立刻松弛。”就人的普遍生存状态而言，或就世界普遍交换的现实而言，每个人都离不开人际交往所构建起的一张关系网络。渠敬东指出，每个人不是社会世界构造的原点，而是关系点，是联络点，依照相对应的亲疏远近来确定不同程度的关联，逐次外推。在中国长期的传统生活里，中国人的社会存在绝不是一个独立的原子。而是像费老所提出的“差序格局”——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比如，举办婚丧嫁娶仪式、开展农事生产和合作分工、进行商业经营的扩展等等，在中国典型的“人情社会”里，人际关系网络便参与构成了中国人的生命根底，而这一网络既有先定的，同时也是基于乡村社会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及交往方式在不断延展和变化的。

人际交往网络的既定性更多体现在生命的初级阶段，即一个人因出身家庭而生发出来的一些远近亲友关系。而在生命的展开中，因为生产生活活动范围的扩大而产生的人际交往需要和人际交往网络的构筑。

在《金翼》中，黄东林和张芬洲合伙经营量米和咸鱼的买卖，一阳和卢国把黄东林引见给中亭街上的鱼店老板；为了解决款项困难，同城市里的天济钱庄初次建立起联系，为店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为方便货物运输，黄东林又同另一阶层的人——搬运夫开始了接触……在日后的发展中，黄家交到商界政界的各种朋友，逐渐编制了一张广大有力的人际交际网，命运兴盛。在文章后面关于轮船公司的生意上，有这样的记述：“五哥曾经是联系他们所有人的强有力纽带，他曾是一种力量，以他的友情和对于劳动沿江商贾们的同情，维持了轮船公司的整体性”。然而，五哥的死使轮船公司的两个派别发生冲突，极大地冲击了整个轮船公司的关系网；黄东林通过三哥的结拜兄弟的关系，联系到湖口驻军的直接上司，成功营救李宽……正如《金翼》里指出：“一个人为了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必须与不同圈子中的人们发生多种联系”。维护良好人际关系网络，使人际关系的体系处于均衡

状态是中国社会根底性的追求，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人的生命行进就是“摇摆于平衡与纷扰之间，摇摆于均衡与非均衡之间”。

在社会人际关系网络限定个人行动的同时，个人在经营人际网络关系中也得到不断的历练。中国人在人际关系处理中，因为其中的磨难和过错学会如何更好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如何更好地进行人事关系的联络与处理，如何更好适应变迁和促进个人和家庭的生命行进。正如《金翼》中的黄东林，青年时代与芬洲一同闯荡，其后从过往经验中学会与朋友携手并进而取得成功，最后在暮年平静地告诉孩子们：“别忘了把种子埋入土里”。

2.3 土地的给养与粘结

林耀华在《金翼》中写道：“土地是祖传的家庭生计，务农是基本职业。”土地对于中国传统社会而言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土地作为具有自在生产力能够供人们精耕细作以发挥给养之作用，而随着历史演进而逐渐形成的如“一田二主”、“一田三主”等不在地主制度又发挥着重要的社会粘合作用。

土地的给养是实质意义上的物质给予，人们在自己的“半亩三分田”精心劳作，亲手种植出粮食以供给自己的生存所需，这是乡土中国人最首先的生命根底。《金翼》中也有明显的体现，即在黄家兄弟的谈话中，总不会缺少对于犁田耕地、播种收获和交纳农业赋税等农事的筹划，土地与粮食仍旧是全家在商业经营之外所共同占有的重要财产。“男耕女织”的传统耕作制度更深刻着中国历史精神的养成；例如长期的农耕生产使之形成了务实、质朴的民族精神；此外，农民对于固守在地上获取稳定的生活给养的追求，形成了喜好和谐稳定的性格特征。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很好证明了中国人的生命根底深植于乡土。

实际上，在现代语境下，更应该关注土地所具备的社会粘合作用。这种社会粘结首先体现在保障农村环境的稳定。黄氏兄弟那时是“自佃农”，以租地农人的身份进行耕种，而每逢收获的季节，地主便会派出管家到村里来征收实物地租。土地的租佃关系在彼时是十分常见的。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一田二主”或“一田三主”的土地制度，“田底权”

归地主所有，而“田面权”则归土地的实际经营者所有。这就导致了农村普遍存在的是佃户，有效的防止了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和巨大无比的资本以纯私人的方式对农村生活进行侵入和剥夺，从而小规模地保证了土地的相对小块经营，保护了乡村基本生活的稳定状态。“不在土地”的地主脱离了土地而长期生活于城镇地区，成为了联结农村和城市最重要的枢纽，有助于保障以农村的家庭结构涵养农业，进而加强农业社会内部粘结的重要意义。

土地，对传统社会的中国人而言，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根本性存在，是其重要的精神依归和情感依托。中国人的生命行进中，离不开乡土的生命底色，对土地永远保存着真挚的憧憬与怀忆。在《金翼》中，黄东林虽已习惯于城里的商业经营，但仍“偶尔拿起锄头绕着田走，……，就像所有农民在灌溉季节所必须做的”。“离家乡的几年之后，他开始怀着一种至爱的心情看着葱茏的田野。……在一派宁静的气氛中他漫步在田间小路，远离喧嚣繁忙的市镇，他感到完全摆脱了心理上的负担。”无论社会如何变迁，无论面临着多少喧嚣与纷乱，只要土地在，传统社会里中国人的生命根底就在，人们可以从土地上获取足够稳定的心理抚慰和精神满足。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粘结剂，保障了农业生产的历史承递，保障了中国人与乡土土壤的时代联系，形成支撑中国人社会生命根底建构和生命行进的始初基础。

2.4 由祖先神明崇拜生发的仪礼信仰

老百姓的仪礼或社会生活是除种地吃饭之外，中国农村社会的重要粘结剂。

祖先对于一个宗族而言，具备一种至高无上的先验性。基于对祖先的敬重与崇拜，中国古代社会显著的敬宗收族的宗法思想表现于大规模的集体祭祀活动，人们借此向祖先表达内心对于生活富足安定的美好期许，希望祖先先人能够治理教导后代，荫庇子孙。长期以往，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祭祖仪礼，一方面有效地巩固和强化了家族组织、宗族制度，巩固了以男系血缘为中心的宗法血亲关系；另一方面，祭祖、上坟等仪礼作为表达对祖先的怀缅、哀思的方式，其中所包涵的“孝亲敬祖”等宗法思想长久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模式——比如，重视宗族义序的差别，对夫孝、对君忠等

价值观念；集体主义的群体至上观念，强调个人义务履行对维护家庭、宗族等集体利益的重要性等。作为传统宗法思想的典型表征，其中蕴含着的丰富的传统宗法观念已经成为中国人生命根底的重要构成部分，对于有效地保持着个人与宗族社会的紧密联结、情感上的集体认同发挥着关键作用。而在各种集体的宗族活动中，宗族内部成员得以从惯常的机械中脱离出来，大家的情感交流与联络得以加强，集体意识、团结意识也得到巩固；而当这种宗族组织的团结得到外延，便组成了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集体团结和长期相对稳定。仪礼的进行对应专门的场所——祠堂。祠堂所承载的支撑集体宗族活动以及凝聚宗族集体意识的特殊意义在此不做赘述，其彰显的古代传统社会的政权和宗权的结合特征以及对于教育、保障、规范个人几乎各方面的社会活动的深刻影响是值得关注的。林耀华先生在《义序的宗族研究》中也写道：“除祖宗祭祀和迎神赛会外，祠堂对于本族的日常生活而言，常设有乡塾、书田、义庄等公共制度，同时也作为宗族的最高司法机关，具有公议公判的职能。此外，祠堂也有协助官府征收粮税、管理契事、认宗联婚甚至拼乡械斗的功能。”

谈及传统仪礼，定然离不开婚丧红黑两端。在《金翼》中，便分别对红白两事的仪礼过程做了十分详细的记述。惠兰姑娘和芬洲儿子茂德结下姻缘，在定亲之前便经历了繁复严谨的“程序”而达成了成婚的最后协议。婚礼上的会场布置、游行花轿的巧妙设计，礼仪性的沐浴、婚礼的着装、祭灶仪式、三拜九叩……通过婚礼囊括了众多传统仪礼，体现出两人成婚不仅是个人之事务，更是两族间的交错、家族生命的承继与延扩。在小说中间部分又记述了芬洲妻子黄氏的丧礼。举办丧事，“阴间灯”将死者送至阴间、用“灵钱”祷告死者灵魂、占卜未来、穿丧戴孝、每日烧香祭拜；由人变鬼。其后便有宗教作法仪式，由丧礼变成祭礼。一个人的生命走向尽头，以复杂的丧祭标志着生命的完成以起到告慰死者先灵，抚慰在世者情感之意义。通过如公开吊唁等公共活动，加强人们之间的社会纽带。而诸如此类的仪式，便“完成了活人对私人、以及所有人对死者家属的责任。”

这些仪礼传统代代相传，不断更新着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和社会成员构成。借由传统仪礼，中国

人搭建起沟通人灵世界的桥梁，神圣性的延展使人们在生活的困顿、失意和机械中得以回温感情，得以加强彼此间的情感联结。对于祖先神明这种先验性权威的崇拜感情得以通过具体的活动进行表露，达到心灵的保护和提升，使中国人在生命行进的过程中不至于茫然和孤立，而是在精神信仰的坚守中，将自身的社会生命延展到更广阔的世界。

2.5 家庭、家族主义文化

以家庭为基本单位逐渐扩大形成的关系社群即所谓家族。在中国长期的传统社会中，由于交通、地相等因素的限制，人们的生存生活状态也相对封闭，导致家族的意识观念呈现不断加强的态势、家族关系也十分牢固。《金翼》中表现出来的黄、张两家各成员的活动，也都深受家庭、家族主义文化的影响。书里面写道，在祖父去世后，黄东林“自然”地承担起了一家之主的责任。他与张芬洲合伙经营商业，为的是把自己的家庭重新走向“均衡”、稳定的生活状态。他打赢官司，争取到了众人的尊敬和信任。他精心培养儿子向商业、农耕、学界、政界方面发展，在家庭关系和人脉经营上处理得当有序，整个家庭、家族走向富足和睦。程书强指出，家族主义是一种社会哲学，其高度重视家庭、家族等社会组织结构对于传统社会地方治理的重要性；此外，家族主义更是一种普遍的价值观，体现为一种个人意识的淡薄，而坚持家庭、家族等集体利益至上的社群主义、集体主义，是对个人的责任要求和价值向导。

首先认识其作为社会哲学的存在。费孝通先生曾提出有名的“差序格局”理论，指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亲疏远近格局是以近己为中心组成的同心圆。其突出特征就表现为“家文化”的伸缩性和相对稳定性。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文化包罗万象，其中有父系亲属为主干的等级格局，传统的尊卑次序等为家庭或者家族提供了一整套相对完密的活动规则和行为规范，每个人都会在这种理论化的情感逻辑中找到自己的社会定位，在家庭、家族的复杂网络交织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自愿接受作为社会哲学的家庭、家族主义文化的指导。尤其是在传统社会的地方治理上，官府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更多依靠地方的乡绅阶层或不同家族自发组织有关经济

活动、社会教育等事务。当这种文化逐渐扩大，形成了家族以外的其他社群、机构（如地方企业等），其影响力便泛化至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次认识其作为一种普遍价值观的存在。《金翼》里对于跟族长阿水进行博弈的黄东林而言，取得胜利不仅仅是个人声誉的获得，更是对黄家、对一整个家族的尊严和名誉的捍卫；对于暮年的黄东林而言，最欣慰的莫过于看到自己的儿子分别在学界、政界、商界都取得了成就，这些成就是家庭式的成就、是家族式的成就……黄东林的个人始终怀着对自己儿子和家庭的最大关心，运用他个人的耐心、智慧和权力，去精心筹划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当意识到家庭、家族主义这种价值观实质上是中国人的生命根底之重要构成部分时，便承认了中国是十分典型的集体主义主导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之中，每个人都天然地被赋予一种崇高的价值追求，不是一心为已的个人主义，而是坚持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的原则，注重整体，追求和谐，最终目的依旧是服务于整个传统社会的“均衡”状态。

这种家庭、家族主义文化的形成有其必然的历史逻辑，原因有二。一是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中基于对生存的需要而使得人们愿意联合称为集体共同发展，这种生产上的“依赖性”逐渐成为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思维习惯，反过来指导人们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二是基于宗法血缘、家国同构的社会格局形成的儒家思想浸润下的谋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理想的影响和促进。总体而言，家庭、家族主义文化时至今日仍影响深重。

3 中国人的生命行进

将“上苍”理解为人类本身，首先承认了人们与生俱有的一些生命根底是早于人们的到来而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既定。即许多的生存生活条件已经是给定了的，而且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中国人的社会生命。但是，这并非落入“宿命论”的话语陷阱。事实上，生命根底构成了我们生存的基础，但在实际生活中的仍存在各种各样的偶然和变化，冲击着生命的“均衡”状态使平衡垮台。“人类生活螺旋式发展，总存在一些会使生活脱离常规的阶段。“每一阶段引起一场危机，每场危机都激起变化。”林耀华在《金翼》中提及了四种力量：第一，

物质环境的变迁促使适应于它的技术变迁，结果带来了这个体系内人际关系的变迁；第二，由于一种技术上的原因所产生的技术上的变迁，也会导致人们日常关系的变迁；第三，人物及班底的变换也会促使人际关系变迁；第四，一个体系之外在因素的改变时也会促使这一体系之中成员间关系的变迁，并波及这一体系中的所有成员。人类行为的平衡，每个个体的变动都在整个社会体系中发生，其生活就是摇摆于平衡与纷扰之间，摇摆于均衡与非均衡之间的。

由于自然地相等因素的限制，东林为谋生计而走出深山，在湖口做起了稻米、咸鱼买卖；随着贸易量的扩大，搬运的要求随即提高，他们积极筹划船运，往来于闽江上下游之间，有条不紊地推进着商业规模的扩大；在面临两派政治势力的斗争袭来时，东林和家人向深山避难，富庶的金翼之家遭受了无情的抢劫，黄家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但他意识到损失只是暂时的，正常的秩序还要逐渐恢复。木材生意随即进入了黄东林的视野，他带着工人上山伐木，将福州的柏木装船运到东北部的广阔市场，生意越做越大。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木材生意又遭挫折而最终被放弃，黄东林又重新集中进行鱼、米、盐贸易，经营逐渐走向顺利，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往日的繁荣。从开始到中后期，张家命运的衰败，是芬洲“对家庭以及后来对店铺的不适应”的结果；黄家命运节节上升，离不开东林“从以往的经验中学会了如何去适应命运的潮流，如何与朋友们携手并进，因此他获得了成功”。尽管到了最终阶段，巨大的民族危机，社会政治的演化之迅猛已超越了黄家所能适应的能力范围，而使之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当中。“东林的一生交织着平静与困扰的不同过程，有如一幅浪涛起伏的画卷”。

在此可联想到古代传统儒学思想的发展也有类似的历史逻辑可辅助理解。基于巩固封建统治的现实需要、对外来思想文化的冲击挑战的应变和吸纳、对古代社会经济形态由单一农耕经济发展至资本主义萌芽初现的适应，对社会平民、知识分子上升的社会结构变迁的适应等等，儒家思想始终处于变化和行进中，才使其统治地位长期稳固，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行为选择和历史行进。西方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说法，但社会达尔文主义向来是

广受诟病的。在此，并非主张“人定胜天”等思想，而是要更好地理解“上苍”之所以可被理解为人类本身的缘由在于人可以在后天认识、适应和把握社会条件，自己成为自己的命运主宰。“上苍”意味着人类的命运主宰，“上苍”是中国人的生命根底，是每个生命个体其自身，意味着中国人在生命的行进过程中需通过主观能动去适应客观的偶然变化，达致一种变动下的相对稳定和平衡，实现有效的自我保存和自我实现，描画出人生的一幅波涛起伏的画卷。通过应对新的刺激，积极调整，努力地使“由竹竿和橡皮带所组成的框架结构”不至于瓦解，处于一种“有恒的平衡状态”。

雷蒙德·弗恩在《金翼》的英文版序言里也提到：“过去认为这是一种和平宁静的生活，个人丰富多彩的活动受到温文有礼、孝顺父母、尊敬长辈以及其他社会习惯和礼俗原则的严格约束。这些原则确实发挥着作用，但与此同时，个性也确实实、有时甚至是强烈地表现出来。”比如，在记述三哥和素珍的结婚时就分明体现出中国人在尊重根底性至上的自主生命行进。男女双方交换戒指是首要仪式，对村里人而言是一大创新；在婚礼进行时，新郎打破传统的沉默与新娘交谈起来，并且在整个婚礼中都侃侃而谈……

4 杂想与结语

将“上苍”理解为人类本身，将命运理解为人类社会。中国人的个体生命是仅仅嵌入在社会之中的，人的命运往往是由所处社会之构造所赋予你的。中国人的生命构成从来不是孤立的一个个原点，相反，其更具有纵向的延续性、承继性。一个人的真正意义是时间性的维度展开的，个人的生命会向前和向后延展，呈现一种持续的扩展、绵延状态。

阅读《金翼》，不仅是阅读两个家庭的柴米油盐和生活惯常，不仅是阅读两个家庭的兴衰起伏，更是阅读以此为窗口揭示的中国几千年农耕经济基础之上构筑起的传统社会涵括的血缘亲疏、社会组织关系；生产、生活状态和行为习惯；精神品质特性和道德伦理追求等等。这是在最传统的社会土壤里面孕育出来的中国人独特的生命根底和生命构成，是中国人在发扬个性和生命行进中不可抛却的生命底色。“人类的生活有如起伏的浪潮，时而平静，时而峥嵘。没有人能平静、单调地度过一生。”

认识“将‘上苍’理解为人类本身”的意义便在于以真切真挚的目光去感知故去的传统依旧是中国人最珍贵的财富，认识到在自然、广阔社会里，人的存在是存在很大程度的既定的。我们要做的便是认识到自己并不开始便是作为个人的存在，从而免除一些不必要的焦虑，以更恰当的态度理解社会对于个人的塑造并主动适应更多偶然的或必然的变迁，更好地把握自己的命运轨迹。

中国传统里有“安土重迁”的思想观念，其积极内涵就在于对于中国人生命根底的忠诚与坚守。这些生命根底的丰富构成始终是一根根纽带，让我们在偶尔的失序和混乱中获取自我调节的抓手，重新走向稳定、平静的生活状态。有根，便不像浮萍，随风飘荡。中国人的生命行进是具有深厚历史内蕴支撑着的，每一步都走出了文明的沧桑和力量的力量。阅读《金翼》，以独特的方式感受中国社会学的真挚面容，总使人充盈着感动和力量，久不能忘。

参考文献

- [1] 林耀华：《金翼：中国家庭制度的社会学研究》。
- [2] 刘娜：《社会变迁中的均衡与非均衡——浅析〈金翼〉》，《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7期。
- [3] 陈国：《结构功能主义下的近代中国乡村家庭——〈金翼〉评述》，《山西青年》2018年第13期，第213页。
- [4] 罗雪松：《婆婆：男性世界的同谋——中国现代文学女性形象之一》，《社会科学家》2000年第4期，第83页。
- [5] 曾宪平谭敏丽：《家庭、宗族与乡里制度：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2期，第35页。
- [6] 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第74页。
- [7] 渠敬东：《探寻中国人的社会生命——以〈金翼〉的社会学研究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第108页。
- [8] 王露璐：《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的人际信任——基于三省四村庄的实证研究》，《伦理学实证研究》
- [9] 倪晓燕：《农耕经济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形成的影响》，《江苏广播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第54页。
- [10] 殷剑吴娜：《试论安乐流坑祠堂祭祖风俗中的宗法问题》，《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第107页。
- [11] 程书强：《家庭、家族主义文化的变迁对家族企业发展的影响》，《Enterprise Vitality》2006年第3期，第23页。
- [12] 徐文秀：《中国传统集体主义生成及其现实意义》，《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8页。

收稿日期：2022年3月18日

出刊日期：2022年4月13日

引用本文：李达镐，将“上苍”理解为人类本身——试谈《金翼》揭示中国人的生命根底与行进[J]. 现代社会科学，2022, 2(1): 1-7.
DOI: 10.12208/j.ssr.20220001

检索信息：RCCSE 权威核心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CNKI Scholar）、万方数据（WANFANG DATA）、Google Scholar 等数据库收录期刊

版权声明：©2022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